

伯克特对马克思“两类环境危机”思想的阐释

余幸芷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 要

保罗·伯克特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发掘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内涵。在《马克思与自然——一个红与绿的视角》一书中, 伯克特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一是资本积累危机, 源于资本无限增殖与自然有限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二是人类社会发展危机, 表现为城乡对立导致的物质代谢断裂。两类危机相互重叠、彼此强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价值形式的质的单一性以及对自然的无偿占有。伯克特指出, 为利润而非为需要生产, 必然带来资本积累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 从而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可持续之间的根本对立。

关键词

伯克特, 资本主义, 两类环境危机

Burkett's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Thought

Xingzhi Yu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Paul Burkett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m in North America. He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Marx's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book "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Burkett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Marx's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thoughts on capitalism. One is the crisi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ch stems from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unlimited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limited supply of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crisi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fracture of material metabolism caused by urban-rural opposition. The two types of crises overlap and strengthen each other, which are rooted i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the qualitative unity of the value form and the free possession of nature. Burkett pointed out that production for profit rather than for need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crisi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revealing the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Burkett, Capitalism,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环境问题究竟是技术可修复的外部性，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一追问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作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用于环境问题的分析，系统挖掘了资本积累逻辑与自然破坏之间的内在关联。在《马克思与自然——一个红与绿的视角》一书中，伯克特指出，资本主义内生出两类相互重叠的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1], p. 98)。前者源于资本无限增殖与自然有限供给的结构性冲突，后者则指向城乡对立所导致的物质代谢断裂。两类危机并非孤立的生态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伯克特对马克思两类环境危机思想的理论阐释，进而深入剖析其危机根源，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价值形式的质的单一性以及其自然条件的无偿占有。通过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也为思考超越资本逻辑的路径提供理论参照。

2. 资本主义“两类环境危机”的具体内涵

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资本主义所内生的“两类环境危机”进行了详细阐述。

何为环境危机？伯克特指出，环境危机并非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社会与自然相互建构关系出现不和谐或断裂时的人类发展困境。伯克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内生的两类环境危机——资本积累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二者同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逻辑。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两种环境危机：(1) 基于资本物质需求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不平衡的资本积累危机；(2) 更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质量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的城乡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物质和生命力量循环的失调。”([1], p. 98)伯克特指出，这两类危机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彼此强化，而非各自孤立的生态问题。此外，伯克特强调，两类危机虽都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逻辑，却在作用机制与后果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重要维度。环境危机的本质是资本积累的内生结果。伯克特正是从资本积累的生态危机趋势出发阐释马克思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的([1], p. 99)。

2.1. 第一类危机：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

资本积累危机根植于资本积累对自然条件的过度依赖，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物质吞吐量增长

之间的内在失衡。“资本积累是指以货币(也就是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为代表的价值积累”([1], p. 99), 其以货币为起点, 通过生产、流通实现价值增殖($G-W-G'$), 核心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 必须持续扩大商品生产规模, 从而推动原料与能源的吞吐量增长。而为扩大生产规模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劳动时间消耗更多的使用价值, 这直接加速了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伯克特明确提到: “资本积累转化为作为价值载体的日益增长的材料加工。这种物质吞吐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加速, 也就是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每劳动小时产生的使用价值增加。”([1], p. 99)除此之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固定资本因技术迭代而发生的“道德贬值”或“精神磨损”, 迫使资本家延长工时、强化劳动节奏, 从而进一步提高物质和能量的吞吐量。上述分析表明, 资本积累过程内在地具有加速物质消耗、突破自然极限的趋势。无论是资本无限追求物质产出, 突破自然极限的特征, 还是资本仅以劳动时间衡量财富, 无视自然可持续性, 或者资本的回收利用服务于利润的现象, 都印证了伯克特所说的价值和资本的反生态特征([1], p. 71)。

需要注意的是, 剩余价值的增长依赖于自然基础, 工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提供生活资料与原料。然而, 自然供给能力是有限的, 自然界的再生速度受制于生物性时间和地理性条件, 无法匹配资本积累的速度。由此, 资本积累危机便可能随之出现。伯克特通过援引马克思的判断指出,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唯一真正的普遍危机恰恰是主要农产品或工业原料的短缺([1], p. 104)。而原料短缺则会对资本积累造成双重破坏, 原料短缺一方面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压缩了剩余价值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中断再生产链条引发资本循环的系统性紊乱。此外, 伯克特还通过引用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两点补充, 从“数量”和“性质”两个维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物质需求的反生态性, 说明了资本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 而且从价值形式本身在质上就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对立([1], pp. 101-103)。

总而言之, 资本积累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性, 而是资本积累逻辑内在必然产生的结构性失衡。正如伯克特指出的那样, 这种危机并非偶然的外部冲击, 而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内在产物。资本越是追求效率与规模, 就越快耗尽自身的自然基础。由此, 价值增殖与物质消耗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失衡, 经济效率的提升以生态成本的上升为代价。可见, 资本积累与自然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资本积累的本质是价值增殖对自然的吞噬。

2.2. 第二类危机：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

如果说第一类危机暴露的是资本积累与自然供给能力的冲突, 第二类危机则超越了生产环节, 指向资本主义所塑造的城乡空间结构及其对人与自然物质代谢的破坏。

要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 首先需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分工和相互作用, 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对立’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影响。”([1], p. 109)伯克特是通过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对立的分析, 层层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镇和乡村的分析, 并由此详细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伯克特在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指出, 城乡分离虽然早已有之, 但资本主义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 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农民、摧毁农村家庭手工业, 迫使人口与工业向城市高度集中, 造成城乡对立([1], pp. 109-110)。在这一过程中, 农业与工业被彻底割裂, 农村沦为原料和粮食的供给地, 城市则变为消费与排泄的中心。原本应闭环运行的物质变换, 即土地产出经人类消费后, 其有机成分应回归土地以维持肥力, 这样的物质变换被割裂了。如此, 城市的有机废弃物无法返回农村, 导致土壤肥力持续衰退而城市自身因废物堆积而陷入污染与疾病。马克思对此也有过经典论述: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聚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 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

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2], p. 579)

而伯克特指出：“资本主义对工业城镇和农业乡村的对比造成了一种物质循环，这种物质循环不仅腐蚀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质量，而且也腐蚀了更普遍的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质量。它违反了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提出的‘要求’，即‘人应该把他从土地上得到的东西归还给土地’。” ([1], p. 11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造成了这样一种物质循环断裂，即城乡分割打破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致使土壤肥力流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断裂并非技术手段可以修补的缺陷，而是资本主义分工与所有制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同时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掠夺，工业与农业在资本逻辑下携手推进着这一过程([2], p. 579)。最终，资本主义同时侵蚀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地与劳动者” ([2], p. 580)，使人类整体生存环境陷入不可持续之境。正如伯克特在分析中指出的那样，“总体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分析不仅仅包括农业和城市工业的环境效应。它涵盖了资本主义‘发展技术的整个过程，以及将各种过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整体’……在这整个过程中，资本最终侵蚀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即土地和劳动者。” ([1], p. 118)

由此可见，第二类环境危机并非第一类环境危机的简单延伸，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维度上的生态后果。它表明，环境危机不仅是资源短缺的问题，更是人与自然代谢关系被制度性扭曲的问题。只要城乡对立的结构不被根本改变，只要生产仍服从于利润最大化而非物质循环的健康，物质变换裂缝就只会不断扩大和全球化。同时，在实际的资本主义运行中，两类危机并非平行存在，而是相互加剧。原料短缺激化了城乡之间的资源争夺，物质循环断裂又削弱了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为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这两类危机的产生？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3. 两类环境危机的根源

下面，本文将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价值理论分析、无偿占有这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两类环境危机的根源进行剖析。

3.1. 两类危机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解决，其根源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中。伯克特指出：“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和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之间的冲突，生产条件相对于生产者及其社会团体的异化，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等价表现。” ([1], p. 162)由此可见，为利润而生产与为需要而生产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目的层面的表达。同时，伯克特进一步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能归结为积累危机。相反，这种危机‘揭示’了这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来看，“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危机的一部分，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3]。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生态领域表现为，生产越是社会化、越是全球化的规模扩张，就越是受制于私有制下资本对自然的垄断和掠夺。马克思对此有过论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的作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但现在可能穿透‘直接必然性的界限’。” ([1], p. 55)伯克特进一步指出，这一基本矛盾不仅表现为利润率下降或积累危机，还必然表现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是基本矛盾的外部附加，而是其内在逻辑的自然延伸。

伯克特指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形式，内在地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与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施加的各种限制性因素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正如伯克特所言：“由于其对生产力的剥削性开发，其内在的‘不断扩大规模的自我再生产’的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将生产的自然限制扩大到全球生物圈水平，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能够造成真正全球性环境灾难的社会制度，这最终甚至可能威胁到资本

自身的物质需求。” ([1], p. 60)资本的积累逻辑服从于价值增值的目标，而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再生产则要求长期的物质循环平衡，二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导致两类环境危机反复爆发。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的需要与自然条件的制约直接相联，“生产由需要决定”；而资本主义则彻底打破了这一限制，交换价值和竞争性的货币积累，而非生产者的既定需要(或者其他任何人的)，调控着人类生产的增长和发展([1], p. 55)。可见，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是由其生产方式本身而产生的问题。

3.2. 马克思价值理论分析：价值形式的单一性与自然的多样性

要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揭示两类环境危机的产生，必须进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因为正是价值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伯克特从马克思的价值论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属性。” [4]伯克特认为，生态危机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价值形式的社会制度问题，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形式与自然存在内在结构性紧张。正如伯克特所言：“价值形式在定性和定量上都是从自然的有用性和赋予生命的特性中抽象出来的，尽管价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财富形式——自然和劳动两者特殊的社会化。这一矛盾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掠夺其自然环境的倾向。” ([1], p. 71)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切入点。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质内容和自然基础，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社会劳动，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价值形式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从而引发了价值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冲突。同样，伯克特强调，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严格区分，是理解价值形式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价值作为抽象社会劳动的凝结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没有质的规定性，而自然恰恰是由无数异质的物质形态、生态过程和生命形式构成的。价值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自然的多种多样的质的属性如土壤肥力、水文循环、生物多样性被简化为单一的“资源”或“生产要素”，其价值被还原为市场价格，这正是“价值与自然的矛盾”在日常经济运行中的具体表现。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驱动力驱使它无视使用价值的物质极限，只要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资本就会推动无限制的物质吞吐量，即使这意味着耗尽不可再生资源 and 破坏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

此外，伯克特通过对马克思地租理论进行生态解析，说明了如矿山、瀑布、土地、区位等无人类劳动的自然力为何有交换价值。地租的本质属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形式，源于稀缺、可垄断自然力带来的超额利润，土地所有者从产业资本家中分割剩余价值，地租不改变社会总价值与剩余价值总量。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伯克特指出，马克思充分承认了自然有限性、稀缺性、生产基础性，驳斥了“马克思忽视自然生产作用”的学界批评，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伯克特的论述清晰地说明了，正是价值形式的质的单一性促进了资本积累的量的无限扩张，而资本积累量的增长又推动物质吞吐量增长，最终造成第一类危机即资源短缺与供给中断。同时，价值形式对自然质的差异性的消解加剧了城乡对立的物质代谢断裂，从而引发第二类危机亦即社会发展条件的系统性退化。综上所述，由伯克特的分析可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价值形式运转的必然结果，货币市场、租金改良无法消解价值与自然根本对立，资本无限扩张本性将冲破一切外部生态管制。唯有超越资本逻辑，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共生。

3.3. 无偿占有：资本掠夺自然条件的重要机制

除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价值形式的分析，伯克特还论述了资本对自然和社会的“无偿占有”，这一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批评者认为，马克思将自然条件视为“自然送给资本的免费礼物”意味着其假定自然资本是无限的或没有价值的，但伯克特指出，这一解读建立在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根本性误解之上。“他们没有

把握马克思的使用价值(自然总是对其作出贡献)、价值(在商品使用价值中客观化的必要雇佣劳动时间)和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所支付的货币价格)概念之间的区别和关系。” ([1], p. 61)为此, 伯克特强调要重建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有。根据马克思的定义, 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有”是指某些生产条件下有助于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生产, 却不增加所生产商品的总价值。因为价值的实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这些自然条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不过, 伯克特强调, 资本主义的“无偿占有”绝不意味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条件是没有成本或无限的。相反, 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有恰恰以自然条件的有限性为前提。就像如果土地是无限的, 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伯克特指出,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无偿占有, 正是因为其严格区分了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 自然条件可以贡献使用价值而不增加价值, 这正是无偿占有的核心机制。“自然物的潜在使用价值, 一旦由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科学的发现而被无偿占有, 就变成现实的使用价值了。” [5]资本无偿占有自然力如土、风、水、矿脉等, 并不会提高产品的价值, 反而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降低了单个商品的价值, 增加了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伯克特指出, 除了自然条件, 资本还可以无偿占有重要的社会生产条件, 包括分工、协作、机器生产的生产力, 以及科学知识, 这些都不费分文, 却极大地提升了资本积累的能力。

无偿占有构成了第一类危机加剧的重要机制, 资本以零成本获取自然资源, 必然导致过度开发和快速耗竭。同时, 无偿占有也加剧了第二类危机, 生态成本被转嫁给弱势群体和南方国家, 使全球物质代谢裂缝不断扩大。需要注意的是, 租金机制无法解决无偿占有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给自然定价来解决无偿占有问题, 但伯克特依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指出, 租金本身是价值形式的延伸, 无法消除价值与自然的质的矛盾, 反而可能使无偿占有变得更加隐蔽和合法化。

综上所述, 从制度根源、价值形式与无偿占有三重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 为利润而生产与为需要而生产的矛盾、通过价值形式对自然多样性的抽象与消解以及资本对自然的无偿占有, 必然产生马克思所揭示的两类环境危机。任何不触动这些的市场化方案, 都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

4. 结语

伯克特对资本主义两类环境危机的分析, 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内在必然。第一类危机表明, 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能与自然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 第二类危机则进一步显示, 资本主义城乡对立所导致的物质代谢断裂,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系统性退化。两类危机相互叠加、彼此强化, 构成了资本主义难以自我修复的生态悖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价值形式的单一性以及无偿占有机制的分析, 伯克特证明了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性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技术改良、市场定价或绿色资本主义方案解决生态问题的努力, 若不触及资本逻辑本身, 终将徒劳无功。伯克特的论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也为思考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 [1] 保罗·伯克特. 马克思与自然: 一个红与绿的视角[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万冬冬. 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 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当代经济研究, 2014(3): 15-19.
- [4] 罗顺元. 从马克思的价值论看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论伯克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J]. 生态经济, 2018, 34(1): 225-229.
- [5] 彭学农. 伯克特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范畴生态学意蕴的辩护[J]. 学术交流, 2019(6): 40-48+191.